

中國天主教前景的省思

安貝蒂著 陳愛潔譯

一位名叫馬爾谷的俄羅斯通訊社記者，每年都來聖神研究中心查詢最新的中國天主教會資料。今年，他剛在教宗本篤十六世獲選後到達。他問：「在中梵關係方面，本篤十六世會否比若望保祿二世達致更多成就嗎？」筆者知道他好像許多人一樣，以為中梵關係能夠解決中國教會現時面對的種種挑戰。外交關係是有用的，但是，這不過是構成中國教會整體福祉的多個要素其中之一。

今天的中國天主教會有多大？估計天主教人口有一千二百萬。全國有一百一十六個教區，超過

六千間聖堂，一百零三位主教，超過三千名神父和超過五千名修女。

各方對現時的形勢意見紛紜，由全盤樂觀至徹底悲觀不等。在樂觀這一派，筆者會提出艾克敏 (David Aikman)，他在《耶穌在北京》一書裡，生動地描寫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情況。他確信宗教已經在政治、教育和經濟等方面帶來重要的影響，並用統計數字來證明自己的論據。他指出，在一九九九年，天主教徒的人數為四百萬，現時有一千二百萬。他報導新教徒的人數增長更加驚人，由一九四九年

的一百萬增加至現時的七千萬。¹他從這些數字推斷，在三十年之內，中國可以成爲基督宗教史上最大的基督徒國家。

這些變化會發生一個革命，其規模之大將導致新的基督宗教出現。然而，艾克敏描述爲興盛的基督宗教，實際上不是天主教的情況。他的樂觀差不多等於暗示很多回教徒將成爲基督徒，達致基督徒世界從來未能實現的成就。²

艾克敏的樂觀掩蓋了現實。中國的天主教徒仍只佔人口百份之一，而他們多半是貧窮的、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人。中國天主教的旅程，將是艱辛地邁向遙遠的未來。

其他學者例如柯毅霖神父等，則認爲中國雖然在經濟及社會等方面迅速地改變，但在政治及宗教

等方面，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³支持這觀點的人士指出，對上一次涉及宗教的重大進展，是在鄧小平時代出現，即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表的《十

九號文件》，以及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新《憲法》第三十六條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甚至二零零三年三月頒佈有關整理中國教會的三份文件，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生效的新「宗教事務條例」，也沒有標誌新開放和改變。⁴

從短時期的範圍去看，也許人們容易同意較悲觀學者的看法。如果你長時期的範圍去觀察，你便很可能承認，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宗教在中國已經有很大的進展。

³ Gianni Criveller, "China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Country is Changing, but is the Regime?" *Tripod*, No. 129, Summer 2003, pp. 26-36.

⁴ Cf. *Tripod*, No. 130, Autumn 2003,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new documents.

⁵ Cf. *Tripod*, No. 136, Spring 2005.

¹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pp. 290-292.

² *Ibid.*, p. 12.

爲評論中國教會的現況，就必須看看主教、司鐸、修女和教友四方面分別入手。

主教在中國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以來，每個月至少有一位年長中國主教逝世。到二零零五年底爲止，教會公開方面約有六十五位主教，而地下方面則有近四十四位。十八位地下主教遭受某形式的禁錮。那些一生大部份時間在監獄或勞改營度過的主教很可能在將僅活在人們的回憶中——他們都是英勇的人，爲基督奉獻他們的一切。他們的去世將結束中國教會史上創傷的時期，並迎接空前改變的時期，儘管改變的幅度仍未清楚。

今天，全球最年輕的主教就在中國。他們是活力和生命的標記。至於較年長的神父，因爲長期受苦，所以變得謹小慎微。新主教卻更願意冒險。他們渴望帶領教會進入廿一世紀。他們中有很多人會到海外留學，與地下教會更多往來，在見解上

更趨合一。中國教會的未來在他們手裡。

修女在中國

自一九九一年以來，筆者定期探訪中國各地的修女，並謹慎地觀察修女生活的發展。過往修女一般都是很窮的。她們的住處不過是棄置的修院。但是，如果教會生活有不少方面是依靠修女的話，其中一個用來評價教會狀況的方法，就是看看修女在中國重新開放後有什麼遭遇。

修女們境況已取得很大的進展。今天，兩間修道培育中心爲中國的修女服務，爲女青年提供機會學習修道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國內一些地區亦已成立修會會長聯會。來自香港和台灣的修女爲修女主持退省和工作坊。香港教理中心的成員亦給她們提供教理訓練。每年夏天，大陸都有修女來港接受有關修道生活的特別課程。有不少的年輕大陸修女曾經或現正在海外留學。有些修女是醫生，在中國各地的診所工作。數以百計的年長修女得到年輕修女

的照顧。癲瘋病人因修女細心週到的服務而找到希望。此外，有很多修女正接受訓練，準備為愛滋病人服務。

然而，修女的培育工作仍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有許多修女需要更好的修道培育和學術訓練。尤其重要的是，許多年輕的大學生從基督宗教中尋找生命意義問題的答案，但卻只有很少數修女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能在複雜的環境中服務。

司鐸在中國

相比修女，年輕神父的處境更令人困惑。年輕神父在晉鐸後，便要立刻肩負沉重的責任，而且有時對他們的期望過高。

年輕神父通常比修女有更多有利條件。他們的教育和教育設施是較為優勝；他們得到較多外遊的機會；有更多神父曾經或現正在海外留學。然而，他們比修女要承受更大壓力。在進入修院前，他們要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尤其當他們是獨子或長

子。在進入修院後，他們要面對取得學業成就的壓力。他們比修女承受來自政府的政治壓力。他們爲了灌輸政治而有時忽略了屬靈的需要。

晉鐸後，由於年長者拿從前的神父的品性與這新一代神父的品性作比較，代溝便造成了壓力。此外，很多年輕神父必須在十分偏遠和貧窮的地區服務。很多人度貧窮和寂寞的生活，要靠外國的彌撒獻儀來幫補生活費。

不久以前，一位年輕神父可以期望比同輩的青年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現時中國給有才智的男性青年提供具吸引力的教育機會、選擇和挑戰。

教友在中國

中國的大多數天主教徒都集中在農村地區。在歷史上，傳教士在鄉間的皈化工作較在城市裡更成功。教友也傾向集中在兩個省份：河北和陝西，是全國至少四份之一天主教人口的家鄉。河北也是地下教會的中心，也是有最多主教和教友被捕的地

方。河北省以擁有許多「教友村」而自豪；大多數或所有村民都是貧窮的教友農民。

在這些村落參與清晨彌撒，會是十分感動的經驗。村民的信仰深度是明顯的。有一次，當筆者與來自「支授急難中的教會」機構德國辦事處的兩位女士同行，其中一人在彌撒後感動得無法留下來與人交談。她獨自走到一邊哭泣。

在中國日益增長的消費主義社會，這樣的信仰還能倖存嗎？城市的教友又怎麼樣？一九八零年代的基督宗教熱從沒有在天主教會內造成深遠的影響。天主教會背負著分裂、中梵關係困難重重、重建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的一切架構、需要教育年輕一代神父和修女等問題（只列舉一些困難），所以沒有足夠的閒暇來發展質素好的牧民照顧，面對農村和城市的教友的屬靈需要。有關方面需要履行許多工作，協助人民擺脫迷信，並在彌撒採用本地語的外表形式以推廣梵二的訓導。

雖然很多主教認真看待教友在教會擔當的新

角色，並渴望讓教友負起他們特有的責任，但教友多半仍是教會內忠心和被動的成員，而不是積極主動的。

教會的公開方面與地下方面

一聽人提到中國的天主教會，便會浮現一種雙重形象：一個公開教會和一個地下教會。這種對現況過於簡單的考慮，有點像說：公開教會是忠於政府的愛國教會，不與教宗或普世教會共融；地下教會則是忠心的教會，與宗座和普世教會共融。但在歷史、教會和法典等層面上，實況並非這樣簡單。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在中國沒有兩個天主教會，卻只有一個教會。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十分謹慎，常常提到中國教會是一個的。第二，中國沒有一個「愛國的」天主教會。只有一個天主教愛國會，由共產黨成立的政治組織，負責監察和指導公開教會的活動。

類似的組織分別監察中國的五個獲得認可的

宗教。任何教會能夠自由地運作，是幾乎取決於這些為在愛國會服務的個別人士的品性，視乎他們的動機、知識，以及對宗教的尊重。很多人之所以為這些機構服務，因為這是一份優差，有穩定的報酬和權力。最後，中國天主教會的分裂是政治的而不是教義的。

「公開」與「地下」等字眼並沒有清楚形容事實。只不過有些聖堂已經註冊，有些則未。政府法例要求舉行宗教崇拜的地方必須註冊。公開的，即官方或政府認可的聖堂都已全部向政府註冊。

地下教會是沒有註冊的，而拒絕註冊的宗教場所是非法的，會遭當局封閉和鎮壓。然而，不同的地方政府以截然不同的方法處理註冊及未註冊團體。

地下教會並非真是隱藏的。在筆者曾經探訪的某些地區，地下教會的聖堂位於市中心，既宏偉又美麗，讓人人都看得見。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甚至建在七樓呢！在少數地方，地下教會是區內的

唯一天主教會。然而，在其他地方，人們依然在家裡舉行彌撒或祈禱。這些團體最易遭到公安局的監視。在一些公開的修院，地下主教擔任教授。在少數地方，公開和未註冊教會共用同一座建築物，而在其他地方，兩個團體卻彼此不和。然而在其他地方，一位主教可能是地下教會主教，又是公開教會的司鐸。

我們在西方，喜歡把東西整齊地分類，所以對這種含糊不清的狀況不容易理解。

中梵關係

筆者開始本文時，提及改善中梵外交關係這問題，教宗本篤十六世能否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達致更多成就。若望保祿二世無疑熱愛中國人民，也十分尊重他們偉大的文化。他每天為中國和中國教會祈禱。他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踏足中國的土地，親吻地下和親自擁抱中華民族。但是，這願望從沒有現實。為證實自己的誠意，教宗曾為一些傳教士在

過去福傳期間所犯的錯誤而道歉。他抓住每個與中國及中國教會交談的機會。他當然嘗試盡一切能力來改進情況。

有很多人已談論過若望保祿二世在推翻東歐共產主義的角色。不管這角色是否被誇大，已是無關緊要的。對於中國當局來說，不論他擔當什麼角色，都構成重大的威脅。

本篤十六世的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但他的任務仍是艱鉅的。有人建議「先建交，後來才處理細節。」筆者卻認為，必須先處理細節，然後才建交，以確保原則不受到損害。

對未註冊的教會來說，中梵建交有什麼含意？對於多年來一直忠於和支持教宗的台灣，又有什麼含意？主教的選任又怎麼樣？現時大多數主教經已與羅馬共融，但教會傳統這至關重要的一面，必須審慎處理和公開承認為合法。

教宗本篤在任期間，教廷的官員必須稍為使中國政府相信，教會的使命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

在一個凡事都包括政治含意的社會裡，中國政府能夠明白那種語言嗎？政府必須相信一個不受政府監視和控制的教會，仍能夠對國家的穩定有所貢獻。這不是容易的工作。不論有沒有外交關係，中國的教會仍會活下去，但這樣的關係會肯定是互惠的。事實上，新教宗在其任內初期經已向中國提出建議，顯示教會願意重開對話。

那麼，中國準備好了嗎？很多年輕神父和修女，以及教友在牧民和社會服務等方面肩負越來越多的領導責任，透過他們的忠誠，中國天主教會是有前途的。二零零五年六月及七月份，上海教區及陝西省西安教區的輔理主教先後晉牧，他們二人都分別獲得宗座和中國政府確認。這是中國天主教會準備好下一階段發展的標記。 □